

春运,是现代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特有的社会现象,它是一种发生在春节前后的特殊运输季,背后则是庞大的人口短期集中性流动。因此从狭义来说古人是没有春运的,但是从广义来说,从春节出现那时起,春运现象在古代就存在了,古代过节也有“回家难”。

“回家过年”溯源

为何过年时一定要回家?笔者考证一下,可能与传说“年”是个恶兽有关。传说,“年”长着四只角四只足,力大无比,在每年的最后一天,即除夕便会出来作祟。当时生产力低下,个体对付“年”的能力不足,人多力量大,于是全家人守在一起,等着“年”的来到,合力把“年”赶走。所以不论怎么困难,有什么样的理由,在外的家庭成员都要赶回,助一臂之力。

为了赶走“年”这个坏东西,在一年的最后一夜——除夕,全家都不敢睡觉——“守岁”风俗由此而来。

古代何时开始过年?

据中国最早一部释义词典《尔雅》“岁名”条解释,“年”在唐尧时称为“载”、夏代称为“岁”,商代称为“祀”,一直到周代才称为“年”。据此可以推出在周代出现了现代春节的雏形——过年,古代的“春运”也就应该出现在这个时候。

需要指明的是,由于受自然、政策,特别是封建时代“父母在不远游”等礼俗因素的限制,过去人口流动的数量并不大,距离也不会远,“外出务工人员”并非古代春运的主体,以公务人士和商人为主。由于道路建设落后和交通工具简单,许多人因为路途遥远,根本无法回家过年,即便到了交通相对发达的隋唐时期,“回家难”现象也无法改变。虽然史料上没有具体说明,但从当时诗人留下来的作品中可以看出。

秦代的“高速公路”和“高铁”

“回家难”的背后实是“行路难”,解决春运矛盾,根本上是要解决交通问题。

在殷商时代,中国古人便十分重视道路交通的建设,在安阳殷墟考古中便发现了大量车马坑。到了秦代,中国的陆路交通水平突飞猛进,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,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全国性公路网,这给“春运”提供了便捷。

据《汉书·贾山传》记载,“秦为驰道於天下……道广五十步,三丈而树,厚筑其外,隐以金椎,树以青松。”驰道是秦国的国道。折算一下,此驰道宽达69米。不只路宽,路旁边还栽植松树,注意绿化降噪,这在当时算是世界第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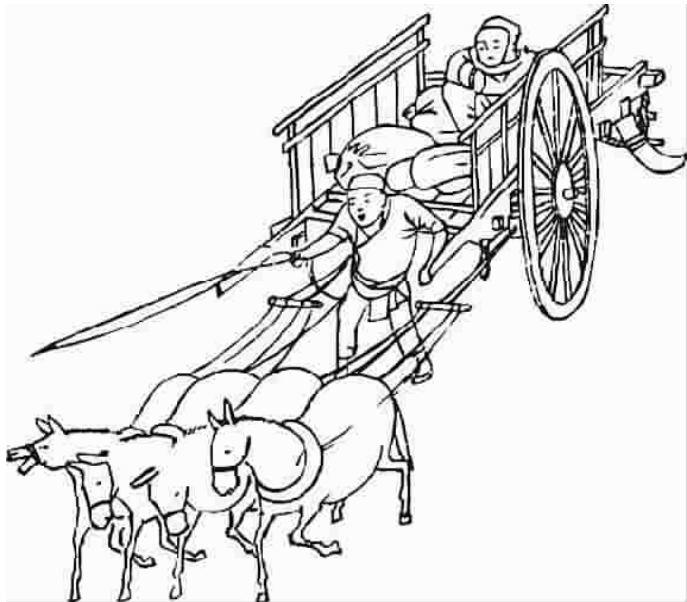
一般人认为驰道为皇帝专用,其实这是一种误解,驰道是“天子道”不错,但“道若今之中道”,也就是说驰道是多功能的,中央部分(3丈宽)才是速度较快的皇帝专车用道,别的车和人只能走一边,与现代全封闭高速公路分快、慢车道,如出一辙。

除了驰道,秦时还有直道,轨路等。轨路是什么路?是当时的“高铁”。当然轨道非铁轨,是用硬木做的,下垫枕木,除了工程材料不同外,与现代铁路基本没有什么区别。马车行驶在上面,速度超快。

秦代有“高铁”,这一惊人结论是结合现代考古发现推测出来的,该遗址位于今河南南阳境内,轨路的存在让《史记》中所谓“车同轨”有了新的解释。

古代中国的“春运”

◆ 倪方六



需要说明的是,秦代的公路网并不是为当时春运的需要而修建的,而是出于军事战略物资输送的考虑,但它对诸如过年这样的民间风俗影响,却是不容忽视的。可以理解它为古代春运史上的第一条高速公路。

古代春运“大巴”——畜力车

陆路交通在古代春运中占有主导地位,随着后期造船技术的日益成熟,水上交通便成了江南和沿海地区旅客出行的主要方式,这一方式直到近几十年,才退出春运客流市场。

影响春运效率的,除了路况以外,还有运输工具。中国不只是最早修筑高速公路和使用轨道交通的国家,还发明了各种运输工具。国外学者认为,车为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5世纪时首创,其实中国人也不晚,使用也很早,史料记载在4000多年前的黄帝时代就有车了。

在古代,驱车动力主要是人力和畜力。中国最早的人力车是犂,犂是轿子的前身,之后又有犂车、独轮车、鸡公车、黄包车、三轮车。黄包车和三轮车出现较晚,黄包车是19世纪末由日本传入中国的,因此北京人称之为“东洋车”。

长途运输,特别是物流主要靠畜力车,它是中国古代的大巴。有马

车、驴车、骡车、牛车等,其中马车是古代春运最主要的工具,和现代长途大巴一样重要,至今在北方个别地方的路上仍能看到马车。

古代春运的主体也是普通人,一般能坐个犂车回家就很显摆了。大多数人只能靠两条腿或牲畜代步,实现“回家过年”的心愿。因为不是一天能到家的,古代路边的小饭店、家庭旅馆、官办驿站也多,食宿方便。

唐代运输有全国统一价

现代春运会动用一切运力以保证节日运输,古代也是。中国过去有官办、商办、民营三类交通体系,但不论是哪一种都是要收费的。逢到节日时,客运和物流费用会比平时贵一些,但相对来说比较稳定。如在唐代,商业运输便有一个全国统一价,并设有最高和最低限价,连里速度都有详细的规定。

以唐开元年间为例,当时相当于现在基层股级干部的九品官,一月工资为3817文,日收入约127文。以“二人顶一驮”来说,抬着50千克的東西走50千米,每人可以得50文,以每天走25千米来说,日收入25文,这在当时可买2斗米(约12.5千克),所以当时的运费并不高。如果走水路,更便宜,“坐船回家”是古人春运时的首选。

最后值得一提的是,现代春运期间会有人做慈善,免费送民工回家过年,在古代也会有善人这样做,送上盘缠,让穷人过年时能与家人团聚。

摘自《百科知识》2014年第2期

母亲邵华

毛新宇



22.他开始对这里产生了依赖和眷恋

大伯对外婆转述了爷爷的嘱托,外婆满口答应了。她又对我父亲说:“孩子,从今天起这里就是你的家,什么缝缝补补洗洗涮涮,你就拿过来,一点儿不要客气。还有啊,你这个妹妹,只有思齐在上学,少华、少林还没念书,你有时间也帮着她们学点儿文化。”

在以后的日子里,外婆履行着她对大伯的那个承诺。每个星期天,外婆都让父亲把脏衣服、被单、枕套统统背回家来,亲自给他洗干净,周一再叠得整整齐齐地让他带走。临走时,还要问他缺不缺钱。那时都是供给制,父亲口袋里的钱时常花个精光。他把我外婆当作了自己亲妈妈,没有零花钱了,就朝她要,从不见外。

那时候外婆家的生活也很艰苦,平时我母亲和两位姨妈很少添置新衣服,常常是一件衣服一上身就再难脱下来,平时连个换洗的都没有。一个周末的晚上,三姨少林照常把衣服洗了,而第二天早上衣服却没有干,她一急,就作了一首打油诗,聊以解嘲:“可怜张小三,没有衣服穿。晚上脱了洗,早上等着干。”“小三”是全家对三姨的昵称。直到几十年后,她的两个姐姐还时常拿这首诗和她开玩笑。

而外婆呢,她宁肯自己省吃俭用,也要让我父亲在生活上宽裕一些,不肯让他受半点儿委屈。父亲每一次来家里,她都要准备足够丰盛的饭菜,并且还要想方设法地变换花样让他吃好。这家的温暖让父亲找到了久违的亲情,他开始对这里产生了依赖和眷恋。

1949年10月15日,爷爷在中南海丰泽园为大伯和姨妈举行了婚礼。婚后的第三天,夫妻俩来到外婆身边,后面还跟着无忧无虑的父亲。大伯叫外婆“妈妈”,他也跟着改了口,左一个“妈妈”右一个“妈妈”地叫。真是嫁一女得两儿,喜得外婆禁不住心花怒放,人也似乎变得年轻了许多。兄弟姐妹们在一起讲故事、猜谜语、下象棋,欢欢喜喜地度过了一整天。从此,这对年轻恩爱的小夫妻包括我父

亲在内,在享受爷爷父爱的同时,主要以外婆这边为家,更多的时间是沉浸在外婆的舐犊母爱之中。此后,思齐姨妈领着大伯回娘家时,父亲总像影子一样跟在小两口后面。母亲不是缠着他教自己唱歌或者跳舞,就是给她讲故事,还跟着他饶有兴味地学上几句俄语。

在这充满幸福和欢乐的日子里,大伯和大姨每个星期天都会去看望爷爷。我母亲时常跟在后面,她人小,胆儿大,嘴儿甜,左一个“毛伯伯”右一个“毛伯伯”地叫。爷爷很喜欢她,一如喜爱小时候的大姨一样。见得多了,就昵称她为“小拖尾巴虫”。几天见不到她,便风趣地问:“今天怎么不见那个小拖尾巴虫呢?”

1949年10月底,已满十一岁的母亲还没有等到上学的机会。我的外婆是她人生的第一个老师。外婆的坚韧、乐观、细心、博学,特别是不怕牺牲不怕困难的人格魅力,影响了母亲的一生。

外婆善于把枯燥难懂的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等典籍,结合身边活生生的社会现实,转换为生动易学的人生道理口授心传给她。教给她儿歌、民谣、谜语、笑话,充满了人生智慧,既极大地培养和提高了她的学习兴趣,又无形中扩展了她的联想空间。在思齐姨妈的直接影响下,我母亲养成了爱写字、爱读书、爱提问、爱思考的好习惯。大伯和父亲进入她的生活圈子,无疑为她的想象增添了远翔的翅膀。苏联的民俗风情、国外许多儿童少年勤学苦练、发愤图强的故事,都引发了她的无限遐思。

来到北京后,昔日的许多小伙伴都随着父母分散居住在偌大的北京城的不同角落。外婆忙于新中国第一部《婚姻法》《惩治反革命分子条例》等法律文本的起草和修改,大姨在上学,因此母亲一个人待在家里看书识字难免枯燥乏味——她毕竟还是个孩子呀!她太羡慕背着书包上学的同龄人了,憧憬着有那么一天能坐在课堂里读书学习,那该有多好啊!

11月中旬的一天,她这个小“拖尾巴虫”又跟随大伯和大姨去中南海看望爷爷。爷爷关切地询问他俩的学习情况,唯独把母亲晾到了一边。母亲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勇气,对爷爷说:“伯伯,我也要上学!”爷爷一愣,问她:“哎呀,该到了上学的年龄,怎么还没上学?”

11.人群炸开了锅

衙前旷场,此时火已经点起,除了拖来的一顶官轿,人们又将衙中的条案、太师椅以及能够搬动的器物,拖出堆成山样,放火烧了!那火借着风势,在众人的喝彩声中,噼啪作响,越烧越大,熊熊火团不断向天空跳蹿;半空的火尖上,偌大的黑烟,阵阵腾入高空。最后,县衙署还是在混乱当中被乱民丢了火柴进去,开始着火。

周祥干刚刚被人抬离县衙不久,只听得一片喧嚷“烧了!烧了!把衙门烧了!”周祥干这时候脑子倏地清醒,不由叫苦长叹:唉呀呀!乱了乱了!这劫狱烧衙门,公然造反呀……自己本是冤枉,持着道义二字,届时申冤,亦可从长计议,也是堂堂正正……可是,现在这么样的,劫了狱,抢了人,除官府妄造冤案一笔勾销外,岂不还印证了那吊眼皮县令当时所做便是天经地义了么?这么一来,自己虽是出了牢房,却俨然坐实了是个罪犯……想到这里,周祥干浑身上下如同泄了气一般。这事情,却又如何收场啊!

许多人因未逮着抢人,又未逮着烧火,还在意犹未尽。正在这当中,一个消息似这风火还快,在人群中传开:吊眼皮县令翻墙出去,与个巡道搬兵去了,绿营马队马上就要过来砍人啦!官府要拖炮过来轰啦!轰然一下,人群炸开了锅!

数万乡民一不做二不休,丢下县衙,顺着县前街往西,浩浩荡荡往府桥街宁波府去。

宁波府署里,毕承昭早就已得报鄞县衙门出事的消息,又晓得冯翊是大门洞开,不发一语,与乡民玩起空城计来,便也冷笑一声,只是派人前去侦察,看他冯翊如何收拾。

没想到,探子一会儿回报:“不得了不得了!暴民冲进县衙,把大牢劫了!”

毕承昭这下张开的嘴巴就合不上了。正来回急转,不知如何是好,慌急不堪的鄞县巡道冲进来跪报:刚才去绿营营房讨救兵,营房却说动兵须得知府大人手谕,所以赶紧来请大人发兵。

毕承昭不由地气急败坏,指着巡道混账畜生王八蛋地骂道:“你等胡乱为政,如今激生民变,却要本官发兵去杀……好几万的,杀

得过来么!到底谁杀谁呀……给我滚出去!”

又有探子脸色煞白一头撞进来,语无伦次:“大……大人!大……大事不好!暴民把衙门烧了……听说冯知县也被丢进火里去啦!”从鄞县县衙到宁波府署,本来相距得不远,出了县前街往西看见了鼓楼,也就到了。可就是这短短的路程,情形却又已经为之一变。浩浩荡荡的人潮里,原来的素面旗幡上,

竟是忽然地写就了大字——“平粮赋”,“立盐界”,“平冤狱”;这么一来,乡民更似有了主张,也更加的气势汹汹,不可抑止。躁动骇人的人潮,携着喧嚣的声浪,势不可挡!

到了这个时候,这乡民就全都变了,原来一个个老实巴交的,现在聚作一堆便胆大妄为,什么都不在话下了;原来一个个脑子清明的,现在一个传一个的,都疯了、邪了;原来锱铢必较的,现在全都大义凛然,忘乎所以了。

俞能贵走在队伍最前头,还有就是两副竹床抬着的张潮青与长庚。隔不多远,可以看见李芝英时隐时现的身影。原来张潮青要自己走,李芝英却说必须抬起走;长庚虽无大碍,可也要被抬着走。只是乱中找不见周祥干,说是已经被周韩村的乡亲抬走了。

宁波府署的大门前,此时已经人山人海,呼声震天,此起彼伏:“知府出来!”“平粮赋!”“立盐界!”“平冤狱!”

毕承昭有如热锅上的蚂蚁,团团转,没了主意。有人忙献计道,赶紧传官军前来解围吧;可是这分明已经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了。那大人赶紧往后边去呀,先离了这是非凶险之地再说,不能吃了眼前亏呀!毕承昭便慌忙就往后院去,可刚到后院,转念一想,不成!官场规矩,平日里尽可作威作福,遇着事情却须守土有责,不管手中有无兵员,寇敌打上门来,无论外敌也好,家贼也罢,可以战死,可以殉节,却不能逃跑,不然追究下来,脱不了干系,且名声大坏,累及子孙……再要是这些暴民把知府也给烧了,那就更是一个死罪了。

转身回来,正遇有人急急来报,说鄞县的巡道被乡买民截住,扔在大门口,快不行了,眼看着要出人性命了!

鄞变一八五二

徐姓氏

